

港、澳、台穆斯林的 爱国情怀与国际交往

赵倩 丁俊

DOI:10.16293/j.cnki.cn11-1345/b.2020.01.007

一、港、澳、台穆斯林概况

(一) 香港穆斯林概况

香港的穆斯林，主要包括外籍穆斯林和华人穆斯林两大群体。外籍穆斯林大多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其中印、巴穆斯林占多数；而华人穆斯林在早期多来自于广东、云南等东南、西南地区，后期逐渐又有来自内陆各地的穆斯林到港定居。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来港的穆斯林并非华人，而是被英国殖民者奴役的印度穆斯林。“16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香港，随船而来的许多印度籍穆斯林商人和海员，成为最早踏上香港的穆斯林。”而华人穆斯林也有可能在此前就到访或留住过香港，但目前尚未发现确凿详实的史料佐证。

1832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成立，并建起了该洋行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一艘商船，由此打开了早期外籍穆斯林定居香港的大门。这些被人称道的印度穆斯林水手，开始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块区域安居下来，并于其街坊上举行每周五的主麻聚礼，由

于他们出色的语言技能，备受英国当局的青睐，遂成为英国人用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得力帮手。

19世纪80年代，穆斯林男子在香港军队和警察中的突出地位开始改变香港穆斯林的社会结构。这些人虽然留居香港，但大都与其母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恪守着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殖民当局对此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他们还开发了一些富有特色的贸易业务，主要集中于九龙清真寺附近。80年代后，香港华人经济逐渐发达，华人在香港的社会地位亦有明显提高，香港因此也成为这时期内地华人谋生赚钱的又一佳地，遂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回族商人及居住广东的回族纷纷入港，或经商或做工。

一战期间，英国人招募了一个印度旁遮普团来港，几乎全是穆斯林军人，香港穆斯林数量因此大增。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香港，但他们保留了印度人看守监狱的工作。与此同时，内地也有大量回族穆斯林来到香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广东及内地又有一部分回族穆斯林入港，包括不少著名阿訇和穆斯林商

人,著名阿訇有杨瑞生、陈倡姜、张广义、达浦生、马松亭等;穆斯林商人则主要来自北京和上海,大部分经营古董和珠宝,20世纪50年代有五、六十家之多,其中较著名的如金财记、源丰公司、中易公司、长城公司、玉和商行、林艺公司等。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当地的华人穆斯林万分欣喜,庆幸自己终于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香港了。而一些居港的非华裔穆斯林群体则开始反思自身的身份归属问题:我们是印度人、英国人还是香港人?许多年轻的南亚人仍然在护照和居住方面存在问题,还有一些外籍穆斯林发现自己的身份随着香港主权的移交而变成了无国籍居民。针对这种问题,中国政府与特区政府积极回应并出台相关政策,为当地土生的外籍族裔提供“入籍”政策,使其身份得到确认并保留他们在香港的居住权。这一政策大大增强了香港非华裔穆斯林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 澳门穆斯林概况

如同香港一样,澳门的伊斯兰教也是该地区的少数群体宗教,印度、巴基斯坦人是澳门穆斯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穆斯林其次,另外,澳门穆斯林中还有一些东南亚、欧美及葡萄牙的后裔。澳门伊斯兰教最早是由中东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在明清之际带来的。明清时期,来澳门进行贸易的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地区,如爪哇、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地的穆斯林商贾,他们有些就地落户,慢慢形成了穆斯林社群,后来一些当地华人也受其影响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关于伊斯兰教传入澳门的确切时间,迄今尚无权威的考证,但学者们大致推断认为,自澳门开埠之后就已有穆斯林在澳了。西方文献中将穆斯林称为“摩尔人”,一些中文文献中则称为“摩罗”。1622年,击退荷兰人进攻的葡萄牙船长热罗尼莫·卡瓦略,他的妻子就是澳门的一个摩尔人。据此可以推测,早在1622年之前,大概就已有穆斯林在澳定居。据荷兰方面的档案,1642年6月20日,一艘从果阿驶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在马六甲以北的卡波拉卡多被荷兰人截获,船上就有9名摩尔人。

到了19世纪初,只有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做生意才属合法,其他在东印度公司船舶上工作的穆斯林均不得进入澳门,故入澳的印度穆斯林并不多。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以此方式占领澳门并将澳门辟为其殖民地。在葡萄牙统治澳门期间,有来自葡萄牙军队中的穆斯林、也有从南亚地区而来的穆斯林留居澳门。

二战期间,不少内地回族穆斯林从广东逃至澳门以避战乱。此外,抗战期间,香港有一些回民馆资助抗日、解救广东难胞的事情被汉奸告发,因此香港的穆斯林尤其是华人穆斯林也遭到日军大规模的报复。旅港的回族穆斯林为躲避仇杀,也纷纷前往澳门避难,他们中有部分人因为颠沛流离与缺医少药,在澳门避难期间去世,葬于澳门摩罗园。抗战结束后,大批在澳回族穆斯林陆续回到广州,也有部分去了香港,还有一些人留居澳门,主要的生计就是经商或行医。留居澳门的穆斯林人数虽少,但清真寺和墓园都保存完好。1960年以来,澳门社会不稳,而香港的经济却快速发展,澳门的穆斯林再次赴港谋生。

21世纪以来,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工人纷纷来澳工作,澳门的穆斯林社区人数速增。如今在澳的华人穆斯林,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迁居而来的各地穆斯林。现居澳门本地的穆斯林人数比较少,大多为印、巴裔,他们的相貌虽不似华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部分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这些外籍劳工与本地穆斯林一起为澳门社会奉献力量,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澳门的社会生活,对中国认同度日趋增强。

(三) 台湾穆斯林概况

伊斯兰教在台湾属小众宗教,历史上关于台湾穆斯林大大小小的移民浪潮共有四次,前两次的移民主体主要为内地华人穆斯林,而后两次的移民主要为外籍穆斯林。第一次移民浪潮发生于1661年,当时,郑成功带领两万多名将士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在郑成功带领的将士中就有一些是穆斯林,这些人被认为是台湾岛上的第一批穆斯林定居者。清朝以来,内地与台湾的

往来变得频繁，不断有内地华人入台定居，一些穆斯林也随之前往，他们大多分布于台湾西岸各处。

1885年，台湾被清朝政府划为行省，为了开发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入台。当时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便应招从大陆迁入台湾。^①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长达50年，占领者竭力要切断台湾中华文化命脉，大力开展向台湾人民强制灌输日本皇国精神的皇民化运动，除神社外其余宗教神祇一概严禁奉祀，甚至不准建清真寺，也不准穆斯林进行社团活动^②；日本占领者还禁止穆斯林在台宰杀牛羊，禁止从大陆聘请阿訇，企图完全割断台湾穆斯林同大陆及世界各地穆斯林的联系。

第二波穆斯林移民发生在20世纪中国解放战争结束之时。这时期，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宗教人士以及许多担任国民政府的军政要职的人员迁居台湾，台湾伊斯兰教再度兴起。这部分穆斯林群体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参与创办穆斯林报刊、建立伊斯兰新式学校与推广伊斯兰基础教育等活动。^③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台当局因对外交往需求，恢复了回教协会，并支持筹建清真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缅甸和泰国的数千名穆斯林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举家迁台，这些人构成了台湾第三波穆斯林移民。这批穆斯林虽从泰、缅来台，但其籍多为中国云南等地，相当于外籍华裔穆斯林。19世纪，曾有部分云南穆斯林因经商或躲避战乱陆续进入泰、缅发展定居，在当地逐渐建立自己的清真寺与社群，因此他们又被称为“云南穆斯林”^④。20世纪80年代时，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期，他们看到了台湾的发展机会，便携家眷迁居台湾谋发展。

台湾第四波穆斯林移民的主体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地区来自印尼的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多。1996年，“台湾印尼穆斯林社团”成立，主要为外籍穆斯林提供服务，进行有效组织管理。在高雄清真寺，印尼穆斯林每个月定期举行固定聚会，凝聚来台印尼穆斯林情感，并协商相关事务。^⑤

二、港、澳、台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一）香港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香港华人穆斯林具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他们始终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抗战胜利后，来自京、沪等地的穆斯林涌入香港，香港华人穆斯林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得到增强。50年代初期，又有大量内地的穆斯林移居香港。自此之后，香港华人穆斯林在人数上超过了外籍穆斯林。^⑥香港华人穆斯林虽生活在与内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始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利益。^⑦其中较为知名的如香港穆斯林楷模脱维善，作为香港回教博爱社前主席，一生践行博爱精神，不仅尽心为在港教胞服务，而且心怀祖国，心系同胞，自1950年起，联众牵手，扶贫济困，持续为大陆贫困百姓慷慨解囊，奉献爱心。^⑧

香港穆斯林向来心系国事，为国喜忧。20世纪60年代，中国第一枚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同期另有其它领域成就，当时香港穆斯林刊物《回民通讯》便刊登了题为《欢呼祖国建设成就》的专文以表热烈庆贺：“新中国成立以来，致力于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短短十年中能制造出这样高水平的机械仪器来，不但能自给，而且能够输出国外，不得不说难能可贵。外国人能做的事，中国人也能做，说不定有些地方还会做得更好……这样的核爆炸，使中国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世界人民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外国的朋友欢呼，中国的炸弹是一颗人民的炸弹，是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⑨

多年来，香港各大伊斯兰团体每年都要组织多次访问团、旅游团、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访，而内地穆斯林访港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⑩

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在香港以保护工人权益而闻名，该协会在1949年即正式成立，当时，为了响应新中国的成立，该协会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香港宗教界第一个支持新中国的宗教团体。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与香港伊斯兰教界间的交往交流日趋密切，互访不断，对加强香港穆斯林对祖国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3月，应中国伊协邀请，香港中国回教协会主席白建中先生一行访问了北京、陕西、甘肃等地，将内地穆斯林的生活及大陆改革开放的信息带到香港，传到世界。1990年11月，应中国伊协邀请，由香港伊斯兰联合会会长玛尔卡姆·塔利克·斐祺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是香港伊斯兰联合会首次组团到内地访问。1997年7月31日至8月7日，以中国伊协会会长安士伟为团长的中国伊协代表团应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会、香港伊斯兰联合会和澳门伊斯兰联合会的邀请赴香港、澳门访问。在21世纪初的不少港刊中，不仅有《广州市伊协访问团来港参观访问》的记载，更有内地代表团与香港伊斯兰教界的联络书信。例如在2003年，甘肃慈善总会穆斯林扶贫助教工作委员会来港访问座谈，受到了香港中国回教协会的热情款待，甘方秘书长写给港方的感谢信也刊登在《回民通讯》上。

2017年7月，应香港伊斯兰联合会邀请，中国伊协会会长杨发明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伊斯兰与一带一路”研讨会，发表题为“发挥伊斯兰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积极作用”的主旨演讲，希望充分发挥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在促进“民心相通”中的重要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相遇相知的人心基础。同年12月6日至10日，杨发明会长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香港。期间，出席了“六宗教庆祝香港回顾20周年暨领袖座谈会成立40周年庆典”，广泛接触香港宗教界人士，与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道教联合会、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华人基督教联合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香港圣公会、孔教学院及香港友好协进会座谈，交流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019年9月，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拜访中国伊协，大家表示各宗教应加强合作，让香港与内地各宗教和谐共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11月，香港伊斯兰教组织联合代表团拜访中国伊协。通过交流和考察，代表团表示要将祖国内地的发展成就和穆斯林享用的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真相告诉香港穆斯林同胞，

让香港穆斯林与内地穆斯林团结起来，为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积极努力。

在香港回归前的五、六十年里，香港华人穆斯林靠着自己的毅力，在港英政府频频压制以及社会总体舆论不予理解的境况下，依旧秉承着“爱国爱教”的传统，成功协助统战事业，助力回归大业，为伊斯兰教事业在香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日益强化着这样的共识：香港既是一个多元文化荟萃交融的地区，也是与祖国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一部分。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香港回归中国。对于旅港多年的华人穆斯林而言，无比振奋人心，因为他们一直希望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香港生活下去。^⑨香港回归后，香港穆斯林更以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事业，为一国两制的践行做出了独特贡献。2002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主席脱志贤先生“铜紫荆星章”，以表彰他和他所代表的香港穆斯林为香港发展做出的贡献。

（二）澳门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澳门穆斯林虽人数较少，但其爱国之迹出处可寻。抗日战争时期，旅居香港的穆斯林前往澳门避难，但曾在澳门执掌伊斯兰教务的杨瑞生阿訇于1939年归真，马志超阿訇勇于担当，成为澳门的阿訇，并在3年的时间内写出《伊斯兰三字经》，用中国文化帮助穆斯林理解教义，并极力团结海内外教胞，马志超阿訇将热忱的爱国情怀与凝聚信众的使命感相融合，成为澳门伊斯兰教界的楷模与爱国的典范。^⑩

澳门与香港命运相似，都有与祖国大陆分割的惨痛经历，也正是如此境遇，使港、澳同胞有着近乎相同的盼归之心，而两地之间更多一份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两地同胞对待彼此的手足之情亦是其爱国情怀的表现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教胞曾呼吁对澳门清真寺的修缮予以捐助：“澳门清真寺，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对澳门教胞集合礼拜有很大的便利，就是本港教胞在香港沦陷时也不少曾往那里避难。顷接本港坟场管理委员会通知，附下澳门礼拜寺来函，由于该寺年久失修，现决定进行修理，约需经费二万五千元，望大家协助，博

爱社为发扬本教互助精神与美德，希望教胞予以协助，不论捐助多少均所欢迎。”^②在1999年葡萄牙将澳门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前，香港伊斯兰联合会曾提供约15万港币对澳门的穆斯林社区予以支持。^③可见，香港与澳门伊斯兰教界之间关系密切，心系彼此，又时刻关注并积极响应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另外，澳门伊斯兰教界在维系着与港教胞深厚情谊的同时，也积极地关注着与内地教胞的交流与合作。2003年2月，《回民通讯》就刊登了题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港澳访问团团长陈广元盼加强内地港澳交流合作”的报道，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香港、澳门访问团于年前应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会、香港伊斯兰联合会和澳门伊斯兰联合会的邀请前来港澳访问。”^④2017年12月11日至12日，杨发明会长参加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澳门。期间，与澳门宗教界代表的座谈交流，加深了两地宗教界的了解和情谊。多年来，这样的互访与互动交流络绎不绝，这是澳门穆斯林与内地穆斯林同胞血脉相连、心系祖国的生动体现。

（三）台湾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台湾穆斯林的爱国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突出体现。抗战初始，曾有大陆和台湾的穆斯林团体出访印度、伊朗、埃及、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向出访国家介绍我国国情并阐述抗战原因，获得中近东国家的普遍支持与声援。同期，台湾穆斯林亦组织南洋访问团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访问，宣传抗日。台湾穆斯林代表团的此类出访活动使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与形象，也为抗日事业争取了更多来自域外的支持。

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台湾同胞历来重视侨务，这是其爱国情怀的又一表现，从台湾及大陆走向海外的侨胞遍布世界各地。在促进与世界各地侨胞的联系中，台湾的回教团体及穆斯林朝觐团作为连接国内与海外侨胞的重要桥梁，一直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例如，台湾穆斯林朝觐团在往返沙特的行程中，必有安排拜会侨社的活动，以互通信息，增强联谊。旅居沙

特的侨胞早年多数聚居于其西部地区，尤其是塔伊夫、麦加、麦地那与吉达等城市，这些侨胞多为来自青海、甘肃、宁夏的回族、撒拉族；还有一些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族的穆斯林。^⑤台湾朝觐团早年的慰问侨胞活动包括专程前往距离吉达160公里的侨胞聚居地塔伊夫探视侨胞，此举受到了海外侨胞们的欢迎，他们尽其所能地款待远道而来的朝觐团。^⑥这对于凝聚侨心的力量及密切与中国的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两岸穆斯林间的往来日渐增多，两岸一家亲的价值认同在两岸穆斯林中不断强化。2005年5月，应中国伊协的邀请，以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倪国安为团长的台湾中国回教协会访问团来大陆进行访问，在京期间受到时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亲切接见，访问团还赴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参观访问。5月31日，代表团一行取道香港返回台湾。两岸伊斯兰教界间这样的互访与互动交流一直延续着，2019年11月，由中国伊协副会长、上海市伊协会会长金宏伟为团长的上海市穆斯林访问团访问台湾，参访台北、高雄等地清真寺，与当地穆斯林进行交流，共叙两岸穆斯林同胞心心相连的情谊。

三、港、澳、台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一）港、澳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香港伊斯兰教界与域外国家很早就有了交往互动。在香港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杂志《穆斯林》中，有《留埃学生之详讯》一文，记载了离港学生初到埃及的经历：“别后十一月二十七抵西贡停泊；四日初三日，过新嘉坡；八日过锡兰可仑坡；十五日过亚丁港；十六日过红海；二十日晨，安抵波赛，是日晚进开罗，此二十七日海程之大概也。抵开罗后，蒙校长另眼看待，优遇非常，埃人以第等不远万里而来，颇表同情，旬日之内，便烘动全国，每人月给津贴二金磅，伙食零用，以差堪维持。现校长并允沙先生之要求，拟再增加中国学生名额，并将为中国学生专设一宿舍，以供住宿之用，此为中国之幸事，亦即中国回教振兴之预兆……”^⑦这段史料反映出诸多重要信息：第一，早

期香港与北非国家的交往路线主要是海上路线，大体上还是延续着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经东南亚诸国、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等地；第二，这批被派往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引起了埃及高层的热烈关注，埃方对自港而来的留学生态度积极，表现出与香港和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第三，这种派遣留学生的形式客观上促进了香港与埃及穆斯林间的良性互动，为日后交往互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至20世纪后半叶，香港穆斯林与域外国家在伊斯兰教界的交往互动日渐频繁。在1978年的香港《回民通讯》中有关于“世界伊斯兰青年联合会举行东南亚区会议”的记载：“世界伊斯兰青年联合会东南亚地区会议，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在香港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参加会议地区有香港、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及世界伊斯兰青年联合会代表等。”^②此类伊斯兰国际会议汇集各国代表于香港，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穆斯林间的情谊，同时也使得香港及中国内地伊斯兰教以更加良好的形象展示于国际社会。

近年来，香港伊斯兰教界与域外伊斯兰国家展开更为频繁的良性互动，积极开展交往交流，且形式渐趋多样，其中包括教界会议、学术研讨、文艺活动及民间互访等多种形式。如在2015年11月，世界穆斯林联盟在港举办“对话及和平共存”国际会议，出席者除本港伊斯兰团体及各宗教代表外，还有来自新加坡、文莱、巴基斯坦、泰国、斯里兰卡、印度、日本、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学者；^③201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伊斯兰在环中国海区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沙特、阿联酋、以色列、英国、意大利、丹麦、美国等国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研究的主题包括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传播、伊斯兰的发展和本土化，以及穆斯林“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和跨文化相互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由于伊斯兰教在澳门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相对微弱的角色，因此很少有资料来佐证澳门穆斯林与外界穆斯林具有规模的交流互动。在澳门伊斯兰教的发展与穆斯林的迁移过程中，香港穆斯林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较少看到域外伊斯兰国家的身影。就有限的资料来看，澳门的伊斯兰史与阿拉伯国家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大多体现在早期伊斯兰教的传入过程中。例如前文所述，人们普遍认为澳门的伊斯兰教是由中东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带入的。而在明清时期，来澳门进行贸易的商人中就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等地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有些就地落户，还逐渐形成了穆斯林社群，甚至后来一些当地华人也受其影响而皈依了伊斯兰。

（二）台湾穆斯林的国际交往

台湾穆斯林很早就与域外穆斯林有了交往交流。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台湾的朝觐代表团利用旅途转机机会，赴访诸如黎巴嫩、约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的穆斯林团体。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台北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时子周先生率领朝觐团于朝觐完毕之后又顺访约旦、土耳其、马来西亚三国；1954年的朝觐团还赴访埃及，并且拜访了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⑤1965年，台湾朝觐团在沙特朝觐后，又先后以“回教中东访问团”名义赴访了西亚北非的多个伊斯兰国家。^⑥

另外，由于伊斯兰世界联盟等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大多设于沙特境内，这些机构也会成为台湾朝觐团赴访的对象，且与台北中国回教协会多年维持着交往与互动，开展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活动。^⑦伊斯兰世界联盟与台湾穆斯林团体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为推动双方以及东亚、东南亚区域的文明对话与学术研讨，联盟与台北中国回教协会合作，并在相关机构、大学等积极促成下，曾3次在台湾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国际穆斯林同胞间的交流与学术研究。

四、结语

历史上，在港、澳、台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群体的发展过程中，皆可见华人穆斯林与外籍穆斯林的身影，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和谐发展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三地的华人穆斯林而言，他们更是自始便怀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感，并对祖国内地保持

着一种天然的归属感，爱国之心与爱国之情在他们与内地及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中处处得以彰显，不言而喻。在心系祖国的同时，港、澳、台穆斯林群体也兼具国际视野与胸怀，与域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积极良好的交往互动。概言之，港、澳、台三地穆斯林与域外伊斯兰国家间的交往，是中国民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对于促进中

国穆斯林与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贡献。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研究”（16JJDGJW013）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赵倩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丁俊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注释：

- ① 赵红宇：《香港宗教的传播与发展》，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 ② Paul O'Connor. Islam in Hong Kong: Muslim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World Ci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3.
- ③ Paul O'Connor. Islam in Hong Kong: Muslim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World Ci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6.
- ④ 马建钊：《香港华人穆斯林的历史来源与社团活动》，载《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 ⑤ 马建福、张宇：《澳门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载《中国穆斯林》2013年第3期。
- ⑥ 汤开建：《明清时期传入澳门的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东正教和犹太教》，载《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 ⑦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90.
- ⑧ [荷] 维因克著，叶蜚声译：《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协定》，载《文化杂志》中文版，1993年第13-14期，第17页。
- ⑨ 澎湃新闻：《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中国心：回民在港澳》，2018年7月27日。
- ⑩ Peter G. Gowing. "Islam in Taiwan", Saudi Aramco World, 1970, Volume 21, Number 4, p.22.
- ⑪ 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573页。
- ⑫ 张志诚：《台湾的穆斯林、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社团》，载《阿拉伯世界研究》1990年第1期。
- ⑬ 同上。
- ⑭ 包修平：《“隐身的穆斯林”：伊斯兰在台湾的发展与变迁简史（1949—2015）》，载《回族研究》2016年第3期。
- ⑮ 刘智豪：《近年来台湾伊斯兰教发展现状及研究初探》，载《回族研究》2013年第2期。
- ⑯ 张宇、杜军：《香港的伊斯兰教》，载《中国穆斯林》2014年第1期。

- ⑰ 敏贤良：《香港穆斯林概况》，载《中国穆斯林》1997年第3期。
- ⑱ 脱新范、姚继德、马建雄主编：《香港回民史料概览（1917-2017）》，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8年版，第59页。
- ⑲ 原文载香港《回民通讯》，1996年10月1日第一版。
- ⑳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蒋坚永出席香港穆斯林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2007年6月12日。http://www.gov.cn/gzdt/2007-06/12/content_646016.htm.
- ㉑ 澎湃新闻：《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中国心：回民在港澳》，2018年7月27日。
- ㉒ 同上。
- ㉓ 原文载《博爱社刊》，1954年4月1日第一版，第5904号。
- ㉔ 同上。
- ㉕ 原文载香港《回民通讯》，2003年2月15日第二版。
- ㉖ 赵锡麟、张中复主编：《主命的传承与延续：回教在台湾的发扬和展望》，政大出版社，2019年版，第265页。
- ㉗ 同上。
- ㉘ 脱新范、姚继德、马建雄主编：《香港回民史料概览（1917-2017）》，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8年版，第475页。原文载于《穆斯林》，第八至九期合刊（1932年4月）。
- ㉙ 原文载于香港《回民通讯》，1978年2月1日第一版。
- ㉚ 《世界穆斯林联盟在香港举办“对话及和平共存”国际会议》，2015年11月18日，http://m.norislam.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id=5884.
- ㉛ 赵锡麟、张中复主编：《主命的传承与延续：回教在台湾的发扬和展望》，政大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260页。
- ㉜ 贾福康：《台湾回教史》，2002年版，第17页。
- ㉝ 赵锡麟、张中复：《主命的传承与延续：回教在台湾的发扬和展望》，政大出版社2019年版，第261页。
- ㉞ 同上，第263页。